

陳澧

亂世中熱情於通經致用的教育家

何碧琪



圖一 陳澧像 取自《清代學者象傳》

陳澧生於一八一〇，卒於一八八二年，字蘭甫，先世本居紹興，六世祖宦於南京，葬鍾山之麓，故書蹟〈行書七言聯〉中亦有款署「鍾山陳澧」。其祖再遷廣東，遂入籍廣東番禺。因讀書處曰東塾，世稱東塾先生。

生於外憂內患

陳澧（圖一）對學術發展具有反省意識，與他成長的年代及地域有關，當時外憂內患此起彼落。道光二十一年（一八四一，三十二歲）英國以鴉片煙事寇粵，陳澧會試不第後抵家，闔家避亂於佛山沙坑村。英軍陷虎門，三元里、佛山民衆紛起，

英軍退，轉戰閩浙沿海。（註一）清廷翌年簽訂《南京條約》，向英國開放廣州、福州、廈門、寧波、上海等五處港口，割讓香港島。其後廣東等沿海地區不時受到侵擾。咸豐七年（一八五七）英法聯軍入侵，城陷後陳澧挈家避於橫沙村水樓。（《年譜》）他在〈重修學海堂碑〉記英法

聯軍入廣東省城，「據粵秀山，學海堂、文瀾閣皆毀。《皇清經解》刻版缺失過半。」（《續集》卷二）次年英法艦隊北上，攻陷大沽口砲台，清帝遣使議和，訂天津條約。（《年譜》）此外，道光三十年（一八五〇）底起爆發太平天國之亂，洪秀全（一八一四～一八六四）起義於廣

西。咸豐二年（一八五二）五月陳澧至金陵展墓，翌年二月太平軍入江寧。（《年譜》）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，五十一歲）太平軍破江南，陷杭州、蘇州。同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，焚圓明園，清帝奔熱河，訂北京條約，清廷割讓在香港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給英國。（《年譜》）

陳澧身處粵東，切身地感受到政治及社會的衝擊，而早在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（一八三三年二月八日，二十三歲），陳澧與同年祀東坡生日，自乾隆中期翁方綱（一七三三～一八一八）招聚文人祀東坡生日，嘉道年間流行於士子間，翁氏門人李彥章

（一七九四～一八三六）與同年程恩澤（一七八五～一八三七，陳澧之師）結「宣南吟社」，祀東坡生日及相關詩會代表士人們對社會、政治的關切，是經世思想的表徵。（註二）廣東沿海受列強侵擾尤甚，陳澧遂從內陸轉向放眼海外，例如他讀《越南地輿志》、顧祖禹（一六三一～

星池二毛雅摩
但有見聞皆學問

偶逢泉石即神仙

鍾山陳澧

圖二 清 陳澧 行書七言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以教育達至通經致用

雖然陳澧早年獲科試第一名，卻

義》，表明：

近百餘年來，經學號為極盛，然解其文字，不復思其義理。其說曰：不解其文字，何由得其義理？然則，解其文字者，欲人得其義理也，今不思其義理，又何必紛紛然解其文字乎？僕之此書，冀有以藥此病耳。

兩年後陳澧在自序中呼籲「後之君子，祛門戶之偏見，誦先儒之遺言，有益於身，有用於世。」（〈與王宗淶書〉，《年譜》）陳澧認為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」（《論語》），完成《漢儒通義》後，咸豐八年（一八五八，四十九歲）起著《學思錄》（同治十年（一八七二）易名為《東塾讀書記》，《年譜》），鼓勵學者「通論古今學術，不分漢宋門戶」，因為「由門戶之爭競」，「有勝負則必偏廢，偏廢則天下受其害矣。」（《年譜》）陳澧始於鑽研學問，終於兼善天下的胸懷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一六九二）《讀史方輿紀要》等書，

試圖考查越南的經緯位置。（圖三）他又以舊作《書〈海國圖志〉後》質於該書作者魏源（一七九四～一八五六）。（道光二十九年，一八四九，陳氏四十歲，《年譜》）與陳澧友善的梁廷枏（一七九六～一六八一，廣東順德人），亦著有關於海防的《海國四說》，由此可見廣東士人學者們竭盡所能為國家找尋出路的逼切。

對漢宋之學反思及貫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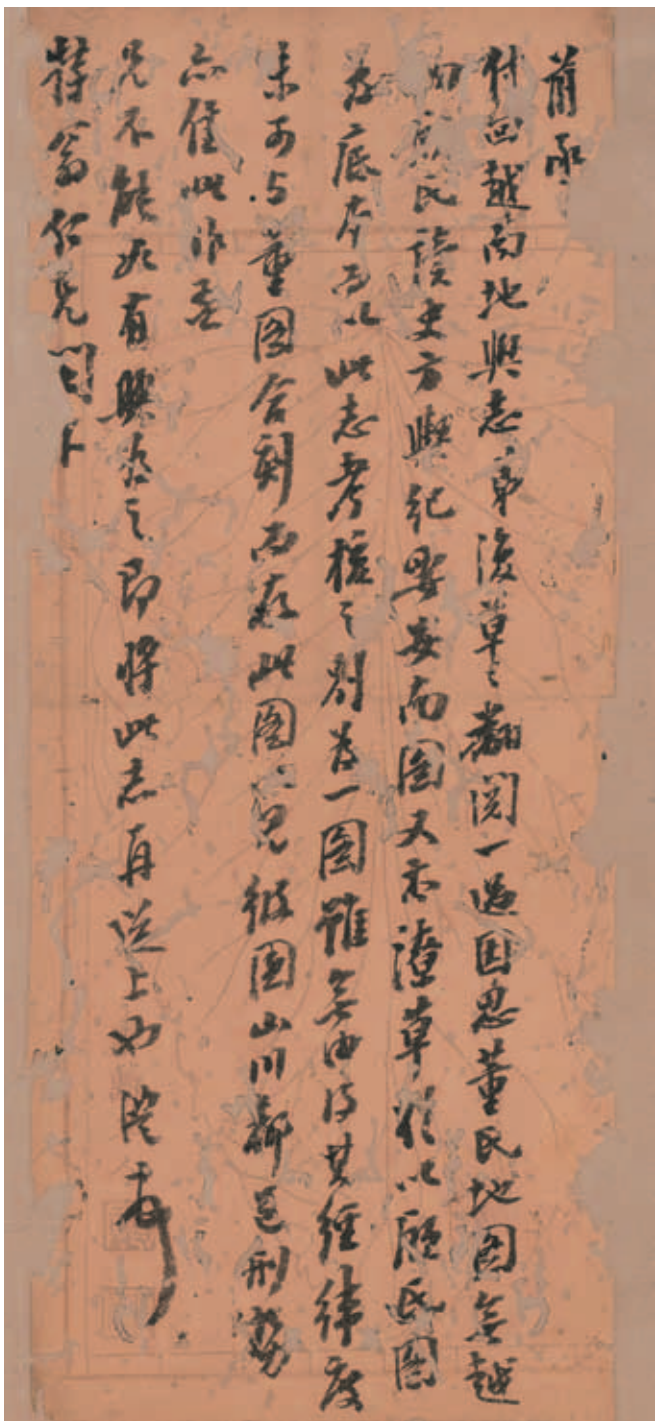
陳澧的學術觀受督學翁心存（一七九一～一八六二）啓發，道光七年（一八二七，十八歲）陳氏科試第一名，翁心存吩咐他「漢儒之學如治田，宋儒之學如炊米飯，無偏重也」（《年譜》），陳澧自此對漢宋之學持開明態度。他觀察當時學術發展至瓶頸，宋理學衰落近百年，漢學亦因大儒凋零，經學考據入門不易，其道

未從此走入仕途康莊大道。他第三次鄉試才中舉人（道光十二年，一八三二），隨即於翌年應會試（一八三三，廿四歲），此後於道光十五年（一八三五，廿六歲）、十六年（一八三六，廿七歲）、二十一年（一八四一，卅二歲）、二十四年（一八四四，卅五歲）、三十年（一八五〇，四十一歲）及咸豐二年（一八五二，四十三歲）共七次參加會試，均名落孫山。（《年譜》）最後一次會試前，他深切體會讀書與出仕不一定有必然關係：

三場策題問小學，音韻及禹貢水道，我十年來所學在此，各條對千餘言，可見讀古書於舉業未必無用，其獲雋與否有命存焉，可不計也。（《續集》卷四）

他更一針見血地指出朝廷以《孝經》及《論語》等「聖人教人之書」試士，「而士但以爲考試題目而已。」（咸豐十一年，一八六一，《東塾剩稿》，《年譜》）

在科舉與教育取捨之間，似乎冥冥中有主宰左右著陳澧的際遇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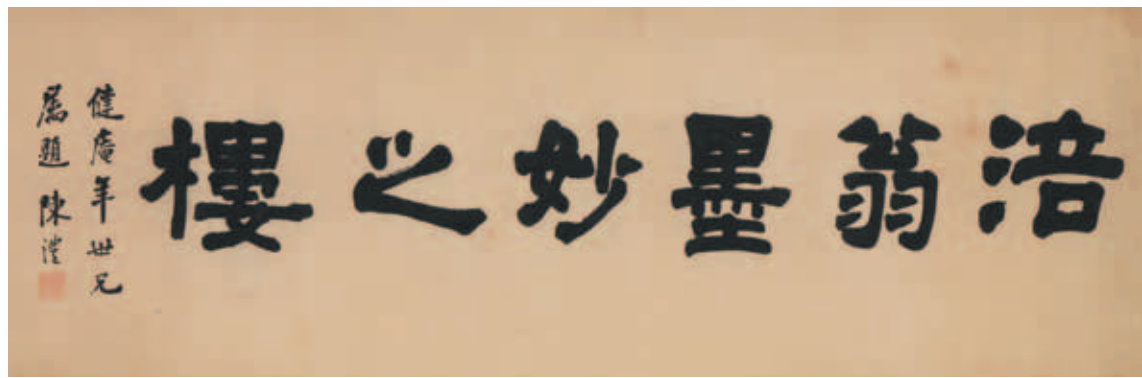
圖三 清 陳澧 書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漸衰。他思考經學發展源流，感慨宋至明儒「自出己意，以說經義，竟無人於漢儒注內尋求義理」，認為「朱子（熹，一一三〇～一二〇〇）用漢儒家法」，「嘗謂朱子乃宋儒講漢學者，道學家不知也，漢學者亦不知也。」（〈與趙子韶書〉，《年譜》）陳澧於是「采兩漢經師義理之說，分類排纂，欲與漢學宋學兩家共讀之」，咸豐四年（一八五四）起編《漢儒通

相比於波折重重的仕途，他在廣東的書院教育系統裡卻通行無阻。陳澧少年時代肄業於羊城及粵秀書院，道光十四年（一八三四，廿五歲）舉首入選學海堂，是阮元（一七六四～一八四九）於道光三年（一八二四）創立。至道光二十年（一八四〇，卅一歲）陳氏已補為學海堂學長，又於同治六年（一八六七，五十八歲）掌教於菊坡精舍。（《年譜》）

陳澧學問淵博，卻關注切合實用的學問、教授初學者的課程內容及傳授方式，這跟他在書院學習的親身經驗息息相關。他二十九歲時（道光十八年，一八三八）反省後學未振的原因之一是入門困難：

澧嘗以為班孟堅（固，三二～九二）有言，幼童而守一藝，白首而後能言，此古今之同患也。夫治經者，將以通其大義，得其時用也。……又諸儒之書，多宏博之篇，寡簡易之作，可資語上，難喻中人，故童蒙之子，次困之材，雖有學山之情，半為望洋之嘆，後學未振，或此之由。（〈答楊浦香〉（榮



圖四 清 陳澧 隸書橫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緒》書），《年譜》）

他又直率地指出「同輩中最為學者李子廸（光彥）太史，每日讀注疏、《通鑑》為正功課，《皇清經解》、《五禮通考》為餘功課，惜乎咯血死矣。」（《覆徐子遺書》，咸豐元年，一八五一，四十二歲，《年譜》）咸豐五年（一八五五，四十六歲）陳澧再次感慨「精深浩博之書，反不如啓蒙之書為功較大，而獨恨百年來未有著此等書者也」（《年譜》），於是他身體力行，撰寫猶如學校教本的《初學編音學》一卷。（《年譜》）他著有《朱子語類日鈔》五卷及《漢儒通義》七卷，即為開通初學者明白朱子及漢儒經注義理的門徑，藉此提倡「凡經學要識義理，非徒訓詁考據而已」，「如為補小學工夫，則漢學、宋學皆其基址，然後可以義理考證合一矣。」（《續集》；《年譜》）

陳澧將個人從學經驗整理，成為菊坡精舍門人論學廿一條（光緒二年，一八七六，六十七歲）（註三），具體教授讀書方法，既切實用、順性情，並警惕學者們的治學態度，例如：

凡為學必先自擇其性之所近而施功焉。性所不近，雖欲為之，必無成也。取一經注疏，或一史，或唐以前詩文一部，或朱子文集語類，閱之旬日，覺有心曉處，即性所近也。

凡為學工夫要專，見聞要廣，專習一書，日日不間斷，且不錯時刻，而以餘功看《四庫提要》，則得之矣。《論語》所云憤悱。憤者心求通而未得。悱者口欲言而未能。此是將得門而入光景。若求通未得，卻言未能，而即退縮，則終身不得門而入矣。

凡史學要知治亂興亡之由。凡讀古人詩文，要取其開我之心胸，養我之性情。

精舍以學問為重，不是為取超等。治經者更不是要作經解。如僕今日有虛名，人皆謂之有經學。然僕自中年以後，不作經解久矣。可見治經不在乎作經解也。初學借經解以為治經之路，借取超等以為學問進益之徵耳。

書卷雖不能豐，亦不可轉相蹈襲為便宜。若以蹈襲為便宜，則亦不便

（同治十一年，一八七二，〈與鄭小谷書〉，《年譜》）曾國藩稱許陳澧精博，著述皆能發明義理，篤實純正（光緒七年，一八八一，《年譜》），二人惺惺相惜，通經致用的思想、學問在不同性情、際遇的人身上發生了迥異的果效。

陳澧深耕學問，卻從未偏離冀盼治學有益於天下的目的。在《東塾讀書記》自序中（同治十年，一八七一，六二歲），陳澧坦言「敬慕亭林先生（顧炎武）《日知錄》，把顧氏「通經致用」的理念應用於著作及教育上。（《年譜》）他在《學思錄·序》（一八五八）中表示「非無意於天下事也，以為政治由於人才，人才由於學術，吾之書專明學術，幸而傳於世，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，其出而從政者，必有濟於天下，此其效在數十年之後者也。」

（《年譜》）陳澧培育學生正是他作為經學大儒展現通經致用抱負的途徑之一，他嘗言德行、學問以至政事互為影響：

言語、政事、文學固斷不可無德行，而德行、言語、政事又斷不能

宜矣。凡學問文章，未有便宜而得者也。凡便宜者皆折本折虧也，戒之哉。

除了撰寫入門書籍、於書院親授門人等途徑外，陳澧的通經致用思想亦以學問累積及刻書為基礎及內涵。上文陳澧述及讀《四庫提要》，是他青少年時代閱讀書法於張維屏（一七八〇～一八五九）所得（道光七年，一八二七，十八歲），張氏謂「四庫書，提要挈其綱」，「從此識門徑」。（《年譜》）至同治六年（一八六七）運使方濬頤（一八一五～一八八九）設菊坡精舍，由陳澧掌教，取顧炎武（一六一三～一六八二）「行己有恥，博學於文」二語，置於前軒。（《年譜》）翌年方氏設廣東書局，刻《四庫全書提要》，他親自校閱（《續集》卷四），並認為「教士有良方，首在多刻書」，由此為寒士提供讀書機會。與陳澧同時的桐城文派及政治家曾國藩（一八一～一八七二）亦曾致書粵東，認為應重刻《十三經注疏》，陳澧得參與盛舉亦樂此不疲。

不由學而入，德行、文學即宋學、漢學兩派也，此兩派者，其末流之弊，皆入於無用，……惟以一端倡率天下而靡然從之，則或為空疏，或為繁碎，不但無用，且有害矣。

（《年譜》）

陳澧效法朱熹撰《學校貢舉私議》一卷，表達對教育的省思及提供切實可行之法。（咸豐元年，一八五一，四十二歲，《年譜》）陳澧學行俱優，張之洞（一八三七～一九〇九）在陳氏七十大壽時（光緒五年，一八七九），集《後漢書》語，自京師贈楹帖：「棲遲養老，天下服德」，「銳精覃思，學者所宗」。光緒七年（一八八一）清德宗上諭賞陳澧五品卿銜，稱道陳澧通經學道，士人出其門者，率知束身修行，與朱次琦（一八〇七～一八八二）被尊為晚清嶺南兩大儒。（《年譜》）

根柢小學、篆書的書學

學問之外，陳澧對書學素有心得，這反映在《與馬覺渠論字學書》（《續集》卷四）及《摹印述》等論著



圖六 清 陳澧 書李陽冰《續雲縣城隍神記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石卒史碑」。余從其言，臨摹數日，覺有規矩可循矣。（一八六六，五十七歲，《續集》卷二）

〈百石卒史碑〉即〈乙瑛碑〉。黃子高曾被阮元選為學海堂學長，著有《續三十五舉》（註四），黃氏卒時陳澧年方三十，可見他早年已學〈乙瑛碑〉，現存〈涪翁墨妙之樓〉隸書橫幅多以自運藏鋒書寫（圖四），減

省波磔及字畫粗細變化，更見樸拙。另外重摹〈琅邪臺刻石〉題記（圖五），參以篆書用筆，字畫勁健而結體穩妥。

相比隸書，陳澧的篆書更為自成一家。他鑽研篆書甚早，曾記道光十五年（一八三五，廿六歲）特別著力於此，他三十八歲著〈摹印述·序〉（一八四七）云：

余謂此秦書八體之一，謂之摹印，古人小學之一端也。古摹印既有師法，故文字精雅，為物雖小，而可與鼎彝碑版同珍，後人為之，不能及也。不講小學，不能作篆書、隸書也。（註五）

陳澧特別注意李陽冰（八世紀中期）篆法，指出「方上圓下」及「撓而無折」二語最得陽冰家法。「方上圓

中。在師友之間的張維屏稱陳澧「餘事工篆隸，行草法元章（米芾，一〇五一—一〇七）」。〈咸豐二年，一七五一，

《年譜》）陳氏的傳世作品確實以篆隸及行草為主。關於陳澧的隸書，他夫子自道曰：

昔余學隸書，臨《史晨碑》，久而不得其法。黃石谿（字高，一七九四—一八三九）先生云：「當學〈百



圖五 清 陳澧 題潘石朋摹刻琅邪臺秦篆拓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下」即如口字，「下圓是一筆撓轉，上兩角方，則兩筆所轉合也。凡陽冰書方者是轉合處，非一筆所接折，故曰無折。」（《摹印述》）他認為「篆書筆畫兩頭肥瘦均勻，末不出鋒者，名曰玉筋，篆書正宗也。」「篆書有

不垂腳者、有垂腳者、有垂腳甚長者，惟二李（李斯、李陽冰）最為適中。」（《摹印述》）陳澧寫篆書末不出鋒、垂腳適中，然未有亦步亦趨地學效李陽冰。康有為（一八五八—一九二七）評陳澧篆法出於黃子高，

美生先生雅鑒

解學索思也知真意

聰穎特達而才儒

陳澧蘭甫

圖七 清 陳澧 篆書八言聯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

亦自雄駿。（註六）誠然，陳澧曾手拓《孔林二墳漢篆》（一八五二，四十三歲，《年譜》），又推動重摹《琅琊臺刻石》（圖五），黃子高在《續三十五舉》即以此二種為秦及新莽篆書之範例。陳澧書李陽冰《縉雲縣城隍神記》（圖六），更多受《琅琊臺刻石》影響，他改均勻的玉箸篆為起筆豐厚、字畫見筋骨的雄強風格。陳澧的書法有深厚的文化內涵，《篆書八言聯》（圖七）「好學深思，心知其意。聰穎特達，文而又儒」句，分別出自《史記》及《毛詩正義序》，表現出陳澧經學、篆學的根柢及其學養、重視教化的價值取向。內涵、書學淵源對學者書家而言大概比風格變化更為重要。書法在當時即為經世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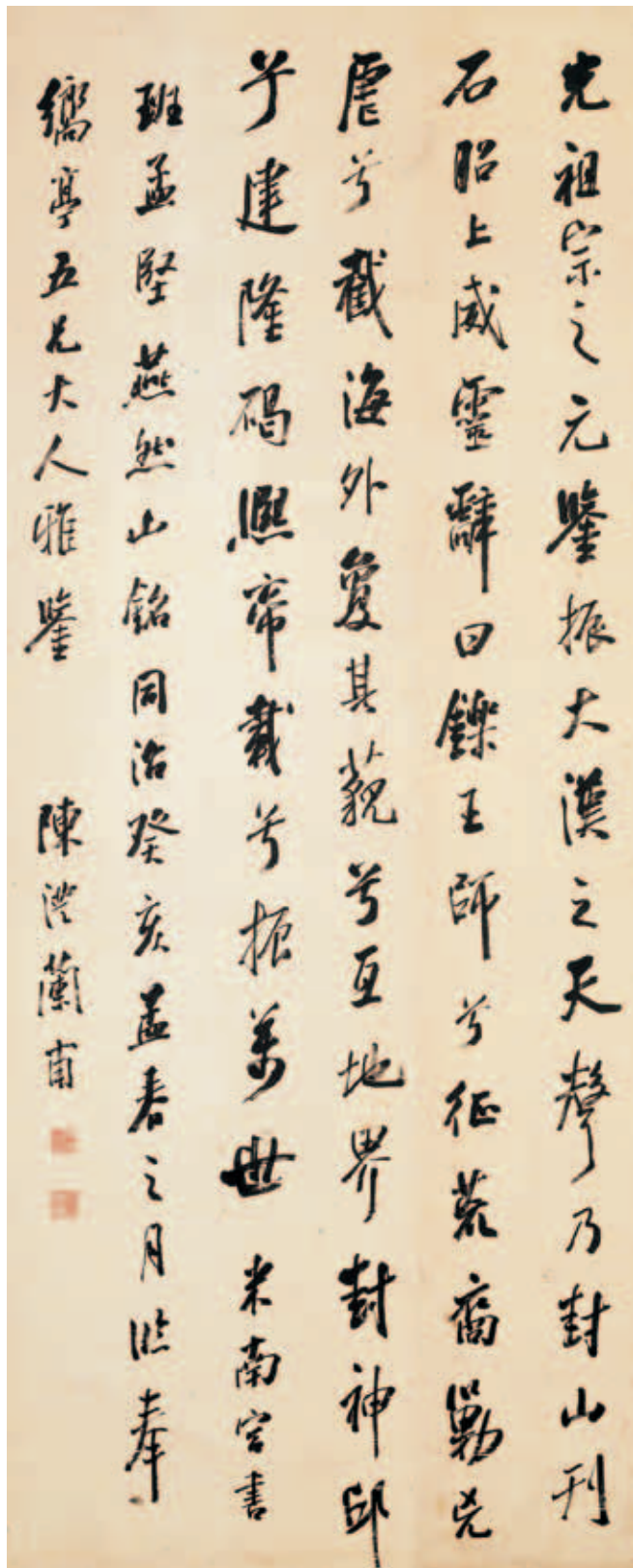
其狀若雲、奇峯之峻美、穠秀之華
翩、自得如飛舉之仙姿、孤竊類逸
羣之鶴、慧若振和風之麗、露露擢

秋幹之鮮、蕭、慶雲之映霄、短、龍章之
動彩九、峯、萬舞、鶴驚、先庭、爵玉、鳴
金、窈窕、合度、宜其、臻、帝、帝、所、留、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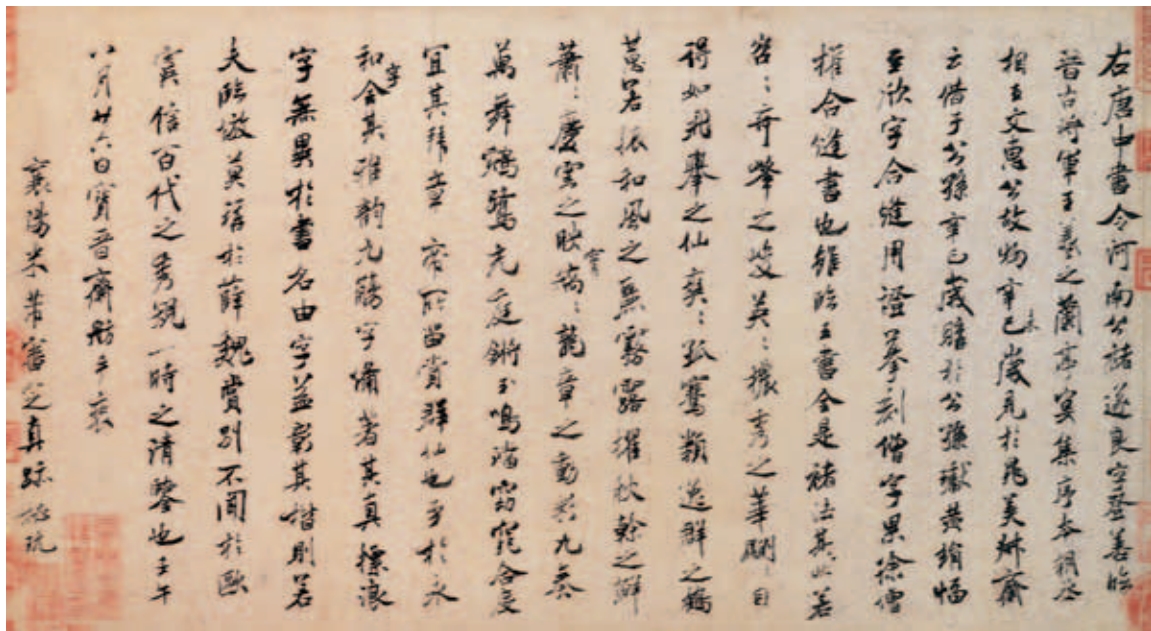
羣仙也、至於永和字、全其雅、韵九觴
字、著其真、標浪字、無異於書、名由字
並彰其楷、則若夫、臨、傲、美、稱、於、薛、魏

賞別不聞於歐、虞、任、百代之秀、規一時
之清、鑒也、壬午八月、寶晉齋、舫、平、宸
馬臣大兄雅鑒 陳澧蘭甫

圖八 清 陳澧 行書四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 清 陳澧 行書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九 清 米芾跋〈黃絹本蘭亭序〉 蘭千山館寄存

者修身的功課，例如曾稱許陳澧的曾國藩，便以「作字」為十三項修身課程之一。（註七）

至於行書，一般認為陳澧受歐陽詢（五五七～六四一）及蘇軾（一〇三七～一一〇一）影響，然張維屏稱他「行草法元章」，故應注意陳澧對米芾的追慕，如其〈行書四屏〉（圖八），文字內容與卞永譽（一六四五～一七二二）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卷五載米氏〈褚登善臨蘭亭帖〉最為接近，而未形似於傳世米芾跋〈蘭亭序〉書法（圖九）。另外陳澧〈行書軸〉（圖十），據款識為「米南宮書班孟堅燕然山銘」，然現存（傳）米芾拓本為楷書（註八），是故上述兩種是陳澧以米氏筆意錄寫或背臨的作品，他仿倣米芾跌宕多變的筆法，結字類歐體中宮收窄，藏鋒用筆。〈行書四屏〉中凸顯字畫粗細、結體豐潤與瘦長的對比，四屏一氣呵成，甚為可觀，陳澧的行書與篆書實非一般經學家可媲美，然而其書名被學問所掩。

長期浸淫在學問與書法裡，陳澧

似乎已將身處亂世的感傷昇華，轉化成孜孜不倦、內斂沉實的治學及書學風格。然而人有悲歡離合，咸豐九年（一八五九，五十歲）陳澧的長子宗誼（字孝通，一八四〇～一八五九）英年早逝，他在墓碣銘曰：「我喪爾，如喪我，以我身，贖爾可」，情辭哀慟。即使歲月流逝，陳澧仍不能自己喪子之痛：

長子死今將十年，偶一念之，猶為淚下。是時所見之物，皆有悲態，所聞之聲，皆有悲音，漸至竟夜不寐，以酒取醉，乃暫時合眼。

陳澧病後「精神不復如舊，以至於今，事事忘記，觀書三兩日即忘，俗事一日半即忘矣。」（〈與楊黼香書〉，《年譜》）經學家並非無情，只是往往把悲愴壓抑或往內心傾倒。回望陳澧走過的一段歷史，戰爭、內亂、五口通商、割讓香港等事件，隱隱地影響著現今的世代。陳澧在亂世坦然自處、對自身的歷史文化時刻反思並抱積極的態度，仍然值得吾人去學習，從中領會，省思人生。

作者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

註釋

1. 陳澧著、汪宗衍（一九〇八一—一九九三）、陳之邁（一九〇八一—一九七八）編，《東塾集·陳東塾（澧）先生年譜》（以下分別稱《續集》及《年譜》）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一九七二），頁二六—二八。此外關於陳澧的學術思想及評價，可參錢穆（一八九五—一九九〇），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九七），冊下，頁六六—一六九〇。陳澧的書法可參考《陳蘭甫先生書畫特展目錄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一九七九）。
2. 《年譜》，頁一五一—一六。關於拜東坡生日的

經世意涵，可參筆者《翁方綱與乾嘉時期碑帖書風及鑑藏文化》（臺北：臺灣大學文學院藝術史研究所博士論文，二〇一一），頁五八一—四〇。

3. 即「精舍諸生手札二十一條」，繫於光緒二年（一八七六，六七歲），《年譜》，頁一一三。全文〈稍異於墨蹟，亦見於《與菊坡精舍門人論學》，《續集》卷一，頁二六—二九。

4. 收入《說印》（上海：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，一九九四），頁一八四—一八九。

5. 陳澧，《摹印述》，《美術叢書》初集第一輯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一九六四—一九七五），頁二五—一三九。

6. 馬宗霍，《書林藻鑑》卷十一，《書林藻鑑·書林記事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一九八四），頁一四一。
7. 其餘十二項為主敬、靜坐、早起、讀書不二、讀史、寫日記、日知其所亡（記茶餘偶談）、月無忘所能（作詩文）、謹言、養氣、保身及夜不出門，見於曾國藩，《家書》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條（一八四三年一月二十日），載《曾國藩家書家訓》（北京：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，二〇〇五），頁二七—三〇。
8. 〈燕然山銘〉圖版見路鵬、文紀等選輯，《米芾書法精選》（北京：當代中國出版社，一九九三），頁一一六。